



世纪文库

儒家哲学

梁启超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儒家哲学

梁启超 撰 于春松 张运生 王晓洁 编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哲学 / 梁启超撰.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208-08720-0

I. 儒… II. 梁… III. 儒家-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6459 号

责任编辑 何晓涛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儒家哲学

梁启超 撰

干春松 张运生 王晓洁 编校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 页 4

字 数 263,00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720-0/B · 767

定 价 32.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潘 涛		

儒家哲学

儒家哲学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2009 年出版)

一、世纪文库

- 《大同书》 康有为撰
《道教史》 许地山撰
《佛学研究十八篇》 梁启超撰
《伏羲考》 闻一多撰
《中国文献学》 张舜徽撰
《中国思想小史》 常乃惠撰
《汉代婚丧礼俗考》 杨树达撰
《儒家哲学》 梁启超撰
《论传统》 [美] 爱德华·希尔斯著 傅铿 吕乐译
《叔本华与尼采》 [德] 格奥尔格·西美尔著 朱雁冰译
《责任与判断》 [美] 汉娜·阿伦特著 陈联营译
《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德] 马克斯·韦伯著 李荣山译

二、袖珍经典

三、世纪前沿

- 《合法化危机》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 刘北成 曹卫东译
《承诺的策略》 [美] 托马斯·谢林著 王永钦 薛峰译
《绩效经济》 [瑞士] 瓦尔特·施塔尔著 诸大建等译
《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 [美] 莱迪·史珂拉著 [美] 斯坦利·霍夫曼编 左高山等译
《责任原理》 [德] 汉斯·约纳斯著 方秋明译

四、大学经典

五、开放人文

(一) 插图本人文作品

(二) 人物

-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德] G·肖勒姆著 朱刘华译
《美国人——殖民地历程》 [美] 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 时殷弘等译
《美国人——建国的历程》 [美] 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 谢延光等译
《美国人——民主的历程》 [美] 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 谢延光译
《数字情种——埃尔德什传》 [美] 保罗·霍夫曼著 章晓燕 米绪军 缪卫东译

(三) 插图本外国文学名著

(四) 科学人文

- 《进化的大脑:赋予我们爱情、记忆和美梦》 [美] 戴维·J·林登著 沈颖等译
《DNA 博士——与沃森的坦诚对话》 [匈牙利] 伊什特万·豪尔吉陶伊著 钟扬 赵佳媛 杨桢译
《超越时空——通过平行宇宙、时间卷曲和第十维度的科学之旅》 [美] 加来道雄著 刘玉玺 曹志良译
《何为科学真理——月亮在无人看它时是否在那儿》 [美] 罗杰·G·牛顿著 武际可译

《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 [比利时] 伊利亚·普里戈金著 湛敏译

《无之书——万物由何而生》 [英] 约翰·D·巴罗著 何妙福 傅承启译

《如何切蛋糕——以及其他数学谜题》 [英] 伊恩·斯图尔特著 汪晓勤等译

目录

导读：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千春松) / 1

儒家哲学

儒家哲学 / 33

孔子 / 128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 195

儒家政治哲学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 / 247

儒家关于法之观念 / 280

儒教

复友人论保教书 / 295

论支那宗教改革 / 298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 305

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 / 315

编者后记 / 323

导 读

梁启超论儒家哲学

千春松

梁启超的思想复杂多变，很难将之归类。这也体现在梁启超与儒家的关系上。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最初也是康之今文经学的追随者。在万木草堂时期，梁启超为之激动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义”，曾决意要宣传而被康有为以时机不成熟而阻止。但是，在《新学伪经考》时期，康梁之间的分歧就开始显露，“启超治《伪经考》，时不复嫌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1]

梁启超的思想在1903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逐渐放弃了流亡日本初期甚为激烈的革命主张。张朋园等认为，在1903年以后，梁启超改变了救国的方针，1903年以前的梁启超，“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更为接近事实，更为合理”^[2]。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在政治立场上与革命派分离的同时，在对儒家的态度上，也不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7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断与康有为分离。他还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1]

深受日本思想影响的梁启超，认为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尊孔的本质是“依傍”，“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2]

的确，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深受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的影响，主张打碎重来的“破坏主义”。因此，许多人认为，在康梁分途之后，梁启超在实质上已经离开了儒家。列文森和张灏等人均认为，梁启超思想的主体部分已经离开了儒家传统。对此，刘纪曜的表述最为系统，他认为，“梁氏在形式上虽仍跟着传统，但是在实质上已离开传统。……在理想上，梁氏肯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会，然而却已完全放弃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圣人作为中心枢纽，而以国民全体作为手段的诉求对象；在论证上，他除了保留形式的道德本体之信念与修养工夫之论证外，其他传统儒家在‘心性’方面的论证，都已被抛弃。”^[3]因此，他的结论是梁启超与丁文江和胡适的立场接近。

不过，也有许多的学者肯定梁启超的儒家立场，比如萧公权等。黄克武先生从四个方面论证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与儒家传统之间的连续性。首先是梁启超在个人道德改造的理念中，依然持道德优先的立场，这与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是一致的。其次，梁虽然重新定义了道德的范围，将“公德”也纳入个人修养的项目之内，但这一想法的立足点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的一致性，这与《大学》的修齐治平和《中庸》的成己成物的理想之间有连续性。其三，他对宋明理学中道德形而上学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06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09页。

[3] 刘纪曜：《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85年。
转引自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25—26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的部分虽然讨论不多，但是他的思想中良知的本体论和其他修身工夫是紧密相连的。最后，梁启超继承了清中叶以来的经世传统，企图解决内在道德、知识追求和外在事功上的成就的统一，并一直尝试着会通中西，这样的观念被牟宗三和唐君毅等人所继承。^[1]

梁启超与儒家的关系还有一层也被人反复讨论，即梁启超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从严复开始，始终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梁启超是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立场和修身理念，并以《德育鉴》和抄录《明儒学案》并将之作为修身之手段等事例作为证明。但是，与佛学一样，阳明学在近代的兴起是出于对于“意志”的阐扬，而且，今文经学家对于孟子一路的偏好也会自然延续到对于阳明心学的肯定。所以也有人认为，梁启超对于王学的提倡，主要是将之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信奉王学。

在1920年所作的《孔子》中，我们从梁启超的身上又可以看到“今文家”的影子。他在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时候，以《春秋》作为孔子政治观念的载体。所以他列有专门的章节来说明《春秋》的性质。首先，《春秋》非史，因为如果《春秋》是记录史实的，那么孔子就不是好的史家，因为《春秋》含有太多的褒贬和“曲笔”；如果把《春秋》看成是历史的话，既把《春秋》毁了，也把史学毁了。其次，《春秋》是孔子改制明义之书。《春秋》是一部革命性的政治书，要借它来建设一个孔子的理想国，所以《春秋》说的是“天子之事”，为万世立法则。第三，治《春秋》当宗《公羊传》，辅之以《穀梁传》和《春秋繁露》。这一点继承了康有为将《左传》看成刘歆增裂改窜的说法。第四，《春秋》的微言大义，传在口说。第五，未修《春秋》与既修《春秋》，这两条都是在说明孔子的许多政治理想是要从《春秋》的字里行间仔细品读出来，而不能拘泥于字面。

[1] 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载李喜所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146—14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梁启超对讖纬之学做了有限度的批评，但基本立场是回复到乃师康有为的今文家的立场上去了。

也许我们需要深入到梁启超的内心世界，来探索他与儒家关系的复杂性。身处新旧转换期的梁启超，经常随着自己的感情触动而改变自己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1〕}将保守性和进取性的“交战”解释为生性上的弱点，多少是把近代士人的普遍性的困境个体化了。在列文森的眼里，这样的困境属于“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他说，梁启超在1898年流亡日本到1911年之间，在知识上离开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却放不开，仍依恋着中国文化。虽然，对于梁之内心矛盾是否可以确定为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学者多有异议。不过，梁启超由康门弟子，转而主张革命，转而又主张改良，并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施展并不杰出的实际政治才能，再转向学术；不但在学术观点上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而且，在行为层面也是峰回路转。

本文就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讨论梁启超与儒学的关系，当然我们的文集编辑也是以这三方面作为基本的分类原则的。

一、 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从《新民说》 到《先秦政治思想史》

总体而言，梁启超言论虽以破坏为特色，但是对于儒家，他始终是褒贬并举。在影响巨大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在谈到儒学一统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影响时，认为儒学对于中国人的风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06页。

俗、名节和民志的确立意义重大。他列举说：“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儒家以名教行世，把名节看作是公私道德的根本，并转化为社会风俗，这样便抑制了人们求利的冲动。“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儒家虽以大同为目标，但现实中还是强调上下等级，这样使小康社会秩序得以确立。

而在不良后果方面，他也提出两条。“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虽然让君主要行仁政和体恤民意，但是如或有君不行仁政，这没有任何的制约措施。因为君有权而无义务，民有义务而无权利，这样中国几千年的政体，是“儒其名而法其实也”^[1]。

还有一项不良的后果是“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只有竞争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政治上的权力独占谓之专制，而不容别的学说之发展也是专制。儒家思想的一尊造成了中国的思想专制，这虽非孔子之本意，但是“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2]

但要说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更为仔细地剖析的要算是《新民说》。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至二十二号，五十三至五十八号）、《保教非所以尊孔》（二号）一样，《新民说》（第一至十四号）也是《新民丛报》时期的作品。

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写作，显然是因为在流亡日本时期，受到了当时影响巨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著作的影响。^[3]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文明要发展，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关键在于国民的素质。他认为西方之成功背后，关键是西方国民

[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3—65页。

[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6页。

[3] 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日本背景，可参看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的一些长处，他希望中国的国民也具备这样的长处，所以要“新民”。

因此，《新民说》很大程度上是中西不同道德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比。虽然在开头，梁启超就宣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并说，他既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也反对“心醉西风者流”，但是在实际的陈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倾向性。

《新民说》与儒家思想最为相关的是天下国家观，公德、私德之辨和自由民权意识的培育。

(1) 对于天下国家，梁启超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基于“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他说：

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半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2]

而反观中国的儒者，开口就是平天下治天下，将国家视为渺小的一物，这导致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世界主义固然是美好的境地，但是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国家应成为一切关怀的基点。

[1]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2]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4页。